

望

Looking Back Home:

刘朝晖
著

乡

望乡：

被安置的移民和他们的文化心念

a Relocated People

and Their Sense of Plac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Looking Back Home:



a Relocated People and Their Sense of Place

被安置的移民和他们的文化心念



刘朝晖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乡：被安置的移民和他们的文化心念 / 刘朝晖
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308-17289-9

I. ①望… II. ①刘… III. ①移民安置—民族文化—
研究—丽江 IV. ①D632.4 ②K280.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8763号

望乡：被安置的移民和他们的文化心念

刘朝晖 著

策划编辑 季 峥(really@zju.edu.cn)

责任编辑 杜希武 季 峥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於国娟

封面设计 黄晓意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8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289-9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

中国人类学界从事应用理论研究的学者应该不少,但能够把应用研究的发现和成果真正运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并对发展项目产生实质影响的可能不多。我从2000年以来,主持由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机构委托的针对在华发展项目的评估任务,以及与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一些有关应用性项目的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合作。在我所主持或参与的应用研究项目中,涉及农村的项目涵盖江西、安徽、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四川、甘肃、新疆和西藏等十几个省(区),所关注的主题包括农业、环境、教育、社区发展和移民等几个方面。我领导的团队主要从事发展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移民安置评估、环境影响评估等方面。这些评估成果都得到了委托机构的高度肯定,很多政策建议直接应用到发展项目的具体实施中。根据我们对一些发展项目的后期监测评估发现:我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不但在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得到应用,而且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人类学的应用性格从其一开始就“自然天成”。人类学在中国发端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经历了一段半殖民的历史,这种历史境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学在中国有自己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和其他西方“科学”一起,为中国的强盛和社会发展服务,这使得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建立之初就具有应用的目标。我们回望发生在20世纪的几个重大的“人类学的应用案例”:从20世纪30—40年代的边政调查、50—60年代的民族识别,到80—90年代由费孝通先生引领带动的“小城镇建设”等社会变革,它们无不是把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实地研究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中去。所以当费孝通1980年3月赴美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学会给他颁发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时,他就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作为演讲主题,说明他自己选择人类学学习的动机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为之“无须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许多国际组织开始介入中国的发展进程,正是国际组织的这种介入,使得应用人类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因为许多发展计划和项目都明确提出需要人类学家的参与,由此中国人类学逐步步入了它的起步阶段。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应用人类学涉及的领域有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移民安置、社区综合发展、卫生保健、教育、卫生等。在发展类型上,它包括增长型的发展计划(例如扶贫项目)、非增长型的发展计划(移民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它应用实践所涉及的地域横跨中国全境,同时包括了农村和城市。综观现阶段国内人类学应用研究,它有如下三个特点:应用研究的项目主要以境外资金为支持,应用实践的主要形式是评估和咨询,以及运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的工作方法。通过对这些实践项目的参与式研究,从学理上,我又提出和阐释了“他者关怀”“参与式扶贫”“内源式发展”等概念,引起学界对如何把应用研究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讨论。

2001年,朝晖进入我的门下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在此之前,朝晖在厦门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人类学学科训练,到我这里来从事博士研究,有机会跟随我参与人类学的应用项目实践。记得他第一次作为团队成员,参与安徽高速公路项目时,就表现出较强的行动力和执行力。此后,他常作为项目小组组长,参与我主持的其他发展项目的评估工作。这种应用人类学训练一直影响了他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毕业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独立承担了亚洲发展银行、英国瑞慈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委托的发展项目,可以说,朝晖继承了我的“社会评估”的“衣钵”。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他能够把发展项目做成“学术问题”,也能够把学术研究运用到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中。其实,对于人类学学科来说,发展项目可以提供给人类学学者更宽阔的视野,包括资料的收集、田野范围的拓展、国际视野的比较,以及将知识转变为行动的实践;反过来,这些应用研究又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田野资料和学术反思的基础。

朝晖这个研究是在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这个研究缘起于他2009年参与我主持的“世界银行贷款云南城市环境项目”的社会评估调查。项目结束后,他经过精心设计和思考,提出从文化保护的视角反思发展项目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问题。幸运的是,2011年,他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

的资助。此后的几年,他几乎每年都往返云南,对项目影响区的移民进行间歇式的、长达数年的实地调查。每次调查最少半个月,最长的达一个多月,其中的艰辛他自己在书稿已经有详细的交代,此不赘述。我在这里想谈谈自己对这个研究的几点看法。

第一,发展项目与文化保护问题。

移民安置过程中对文化要素保护的缺失一直是遭受诟病的老问题。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具体移民安置项目的调查研究,发现文化保护“不在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选择性保护问题突出。目前只有“遗产化”的文化才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對象,而“遗产”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由于受到“威权式遗产话语”的影响,社区文化、地方性族群文化、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亚文化”无法被纳入官方确认的各级保护体系,导致其在移民安置中遭遇被忽略的命运。其次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其实直接涉及对“人”及其社会文化行为的保护。最后是文化权利意识的缺位。一方面,关于文化权利的法律文件里,只有原则、道德,而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另一方面,文化权利的获得既需要来自国家的“赋权”,也需要地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来实现从“文化”到“资源”的转变。因此,作者认为,文化保护“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是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文化保护意识不强;二是对文化保护问题缺乏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导致直接的职能部门和社会参与人员“无从下手”;三是文化持有者缺乏文化自觉意识,不知道“自己有文化”,也不知道该如何保护文化,更不知道该如何采取文化抗争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文化权利。

第二,移民安置与社区重建的问题。

移民安置中的文化保护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抢救性保护”,其保护的成效取决于两个层面:一是安置模式,二是保护理念。在这个研究中,移民安置中有两种基本的社区模式,即民族聚居型和散居型社区模式。社区之于移民不仅仅是新建/重建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可以逐渐培育移民对新生存空间的情感认同。移民安置过程中的文化保护基本点在于对文化持有者及其生存空间的保护。对移民的社区融入和心理创伤的影响程度,在文化适应上亦呈现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社区安置的形式对移民的心理创伤主要在移民发生的后期逐渐显现;二是聚居型社区比散居型社区更能形成文化凝聚力,从而推动移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抗争。尽管绝大多数的移民安置采取的是

社区安置的形式,但移民在新的社区往往需要历经两代,甚至数代的适应性生存才能完成“在地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出现移民对新社区的“不适应症”,而我们往往把它简单地归咎于移民对“物质补偿”不满足,究其深层原因,是移民的新家园空间不能持续地满足移民的文化心理需求和地域认同。

第三,文化保护如何可能的问题。

移民安置中的文化保护行动需要打造一个“一揽子行动计划”。最开始必须进行“文化保护可行性论证”。当发展项目正式进入可行性论证阶段,文化保护必须被视为独立的发展事项纳入其中。聘请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或者个人,对项目影响区域的文化资源进行文献研究和实地的田野调查,初步了解和评估项目影响区内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提交“文化保护可行性报告”。到第二阶段,必须执行“文化保护行动方案”。移民安置工作开始的同时,要立足于“保护、抢救、发展”的原则,根据“文化保护可行性方案”,组建有评估专家、地方文化工作者以及移民代表参与的文化保护队伍,逐步开展文化保护工作。到第三阶段,必须探索实践“社区文化复振”行动。文化保护的要旨是在“有形中现无形”。随着移民安置工程的结束,文化复振和文化再生产成为今后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尤其是通过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与民族文化产业的方式,凸显移民社区文化的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

可以说,本书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回答。不过,该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正视。我基本同意作者自己的反思。一是无法实施行动研究。由于没有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无法开展“干预式”的文化保护行动计划,即使在面对强大市场资本介入的情况下(譬如玫瑰小镇公司),研究者也往往处于“无力的”状态,但作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和追求,反映出其作为人类学学者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二是参与式研究的深度不够。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包括作者在内的课题团队成员只能在暑假期间赴云南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未能较长时间、持续地与移民深度接触。三是未能就文化保护的政策建议和行动计划“问计于民”“问计于官”,以至于提出的若干意见尚待实践的检验。如书中提出的“移民文化小镇”的政策建议和行动纲领一样,真正要实现从“理论”到“应用”,不但需要更具有操作性的方案,更重要的是,再造一个健康的、科学的“发展主义”的现实环境,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要义所在。

早在十五年前,我曾表明自己对于人类学应用性的看法,现在看来,十五年过去了,但问题和观点依然如故。当时我说道:

任何学科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学科才能永葆青春,才能更好地发挥本身的作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学者们过分注重学科的应用,以致忽略了学科的理论探讨,进而限制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应用。所以中国人类学要想在新的世纪更有作为,就必须在坚持应用传统的同时,加强学科的理论研究。也唯有如此,方可造出更全面的应用性格。

再录于此,与作者和人类学界的同仁共勉。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8月31日

前言

你是哪个系的？

人类学系。

人类学专业学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将来可以找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

你怎么选这个没有用的专业？

我不知道。

.....

这个“一问三不知”的对话发生在29年前我与前来接站的老乡之间，至今历历在目。1988年9月的厦门，正值凤凰花开时，我进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就读，记得我是当时全班20人中第一志愿填报人类学专业的两个学生之一。

今天，我依然还在这个“没有用的”人类学领域里徜徉，不为别的，只为那份坚守。坚守什么呢？坚守对人类学的那份信仰。其实，很多如我当初那样的懵懂学子，“对人类学的想象”可能就是入门的初衷。在随后的人类学学习中，我才发现，人类学知识就是那些“俗不可耐”的生活俗事，从婚丧嫁娶到祭祖游神，从谋生方式到社会秩序，只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的呈现”转化为“人类学味道”的亲属制度、经济体系、宗教体系和政治制度等专业术语。那时的我一心专注于这些“纯粹的知识”，一点也不担心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所蕴含的“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人类学是否具有应用价值”的讨论，我曾经为此迷惘：为什么非得要“有用”，人类学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我毫不讳言当时出现这样讨论的学术背景：一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对应的”就业单位，存在“就业危机”；二是在高等教育专业设计的体制中，人类学作为专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迫使“以人类学为业”的大学教师及

其同情者发出“中国人类学应把重心放在应用研究上”的声音。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对人类学的“知识崇拜”，而不愿选择应用性的“行动研究”。2001年，我进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师从周大鸣老师。周师以他自己特有的方法和理念，把“课堂里黑板上的应用人类学”（周师语）带入了实战训练，把我“带出”了人类学的“知识领域”，逐渐改变了我对人类学的“应用偏见”。更为重要的是，应用人类学的实战训练让我跨越学科边界，站在“人类学之外”，在社会科学的视野里，审视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应用理念。

第一次参与的“应用项目”是2002年周师主持的“安徽省世界银行贷款公路Ⅱ及子项目”。这是一个向世界银行贷款修建高速公路的项目，根据世界银行对发展项目的要求，需要对高速公路经过的地区进行“社会评估”，旨在全面了解和分析高速公路的修建对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评估团队采取“参与性乡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的方法，调查了数十个村落，访谈了数十个村民和不同层级的官员，最后提交的调查报告获得了世界银行顾问团的肯定。可以说，这是我真正意义上实践人类学知识的“田野应用”。在经历人类学知识转变为行动的追求中，周师把我“带出”了人类学专业的“知识藩篱”，让我能够在行动研究中“调适”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法，反思人类学视角下的发展问题，以及基于“主位立场”，体悟对项目目标人群的情感关怀。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主持和参与了数十项由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地方政府等机构发起和资助的发展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和移民安置计划工作。在参与评估的发展项目中，不同程度地涉及移民问题，有些项目甚至造成比较大规模的移民安置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除了涉及生计问题，还关乎其民族文化保护问题。尽管项目本身也规定必须制订以社会文化保护为基础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但遗憾的是，由于项目本身的既定目标一般都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囿于项目本身的实施时限、管理机构的职能定位、业主单位追求利益保障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往往很难达到世界银行这类国际机构所要求的“保证少数民族……能享受到符合其文化特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目标。

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我主要关注发展项目本身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讨论和分析发展项目对目标人群，尤其是少数民族移民的文化损害及其文化

遗产保护等问题。我们知道,发展项目涉及的移民安置措施,基本上都是集中关注目标人群的土地、食物、住房、交通、安全等权利的保障,鲜有涉及移民的文化遗产、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文化权利的保护。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践表明,若要妥善进行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少数人聚居区移民安置工作,就是必须制订和实施立足于“与其文化相适应的”发展计划,否则最终可能仍然会造成移民陷入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风险。因此,关注移民安置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

本研究选择云南丽江两个移民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一个是由世界银行资助的涉及城市环境治理的“外资项目”,另一个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筹建的涉及水库移民的“政府项目”。外资项目实施期为2007—2013年,总投资金额达到2亿元人民币,其中世界银行贷款占将近一半的份额。该项目涉及300余人的移民安置。政府项目的具体实施始于2008年,涉及水库移民1657人,到2012年上半年,基本上完成了移民安置工作。政府项目初期的移民安置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在移民安置工作的中后期出现的补偿问题(不公正、不到位、不透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小规模群体性抗争事件,以及移民的“心理创伤”等问题,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反思:在物质补偿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为什么移民仍然会出现持续的心理抱怨和文化抗争。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从这两个移民安置项目中各选择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社区进行参与式调查,其中一个社区是社区重建型的“民族聚居社区”,另一个是社区整合型的“民族散居社区”,在参与观察和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探究移民安置、社区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可行性问题。选择这两个移民安置社区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诸多的可比性,譬如处于相似的时空架构中,移民安置工程已经完成,社区建设和发展正在进行中,而且出现的问题在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在本书中,我仅选择这两个项目,而不是其他的发展项目作为自己“反思发展”的典型案例,原因有二:一是“我”自己在项目中的“角色扮演”,二是可以从“文化”视角慎思发展项目带来的社会问题。

本书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导论,从“文化”的知识谱系出发,阐释作为研究问题的“文化”在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基本内涵,及其如何在发展项目中得到保护。通过评述世界银行的文化保护实践经验,检讨文化保护在移民安置项目中的社区价值、保

护形式,以及如何在发展项目的框架下实现文化保护的目标。

第二章,介绍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交代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民族志历程,检讨参与式评估方法与人类学学科的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应用价值的三个基本立场,并反思作为顾问角色的应用人类学者在参与发展项目中的角色转换及其“文化立场”,对项目实施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第三章,讨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移民安置政策及其实践,关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移民安置过程、政策、法律和结果,尤其关注移民不同的安置方式对文化保护的缺失问题。此外,从世界银行发展项目的移民安置经验出发,比较分析移民安置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在政策、框架、理念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异同。

第四章,详述云南丽江狮子山的移民安置工程,包括项目基本情况、移民安置过程、社区民众的抗争、社区文化资源调查,以及作为遗产社区的重构等内容。分析移民安置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间的互动与权利博弈,是如何影响整个项目的推进计划的,并以此分析发展项目中“参与式理论”在中国情景下的实践和现实困境。

第五章,立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价值”理论,讨论如何从草根力量的视角开展遗产社区建设的可行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保护方式存在的现实困境。反思当下学术界普遍聚焦的底层理论视角(譬如草根权利、参与式发展等),提出批判和建构,明确指出其存在的“地方主义的危险”和市场发展的机遇。

第六章,详述云南丽江七河移民村的移民安置过程,尤其关注移民安置过程中的“文化抗争”情况。内容涉及移民背景介绍、移民安置过程介绍、移民的口述历史、移民的抱怨与文化抗争、移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

第七章,分析移民社区建设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从社区关系、移民心理、文化保护、民族关系、社区治理五个方面,讨论“民族散居型社区”建设的移民安置模式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学理上的理论价值,并从当下出现的特色小镇建设模式的角度出发,审视移民社区改造成为特色小镇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第八章,对移民安置、社区发展和文化保护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具体的

政策建议和行动框架。分析和比较两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安置模式在政策、理念、框架与文化保护等方面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存在的共性问题;从文化权利的视角,提出“移民文化”建构的新理念,并主张通过文化建设的力量,促进移民社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政策建议和行动框架只是基于两个案例,并参考世界银行的有关项目经验而得出的,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应用价值。因此,对于任何可能实施的发展项目中的文化保护行为来说,它们不是教条式的“行为准则”,而只是一系列的操作性建议,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都需要根据实情“量体裁衣”,创新合适的方案。

刘朝晖

2017年5月10日

目 录

MULU

第一章 将知识转变为行动的文化追求 / 1

第一节 文化与移民安置中的文化保护 / 2

第二节 发展项目中的文化保护与世界银行的实践 / 5

参考文献 / 9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伦理 / 11

第一节 参与式乡村评估与人类学的应用性 / 12

第二节 民族志历程 / 17

参考文献 / 27

第三章 作为研究问题的移民安置 / 29

第一节 中国的移民安置实践与文化保护 / 30

第二节 中国移民安置的政策与法律框架 / 37

第三节 世界银行的经验与中国的移民实践 / 43

参考文献 / 49

第四章 丽江狮子山移民安置 / 51

第一节 狮子山项目的移民安置 / 52

第二节 金甲村的“自我遗产化” / 54

第三节 遗产社区的利益攸关方及其抗争 / 71

参考文献 / 78

第五章 从突出普遍价值到社区价值管理 / 79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管理 / 80
- 第二节 遗产社区的空间再生产 / 82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移民的社区发展 / 85
- 第四节 遗产社区空间建构与“地方主义” / 88
- 参考文献 / 95

第六章 丽江七河移民村调查 / 97

- 第一节 “一库八级”与“16118”移民安置政策 / 98
- 第二节 走进七河移民村 / 101
- 第三节 口述的“移民历史” / 110
- 第四节 移民的“权利抗争” / 131
- 第五节 文化抗争:树底老吊桥的故事 / 135
- 参考文献 / 141

第七章 丽江七河移民村社区建设 / 143

- 第一节 社区关系 / 144
- 第二节 移民的心理危机 / 148
- 第三节 移民村里的选举 / 151
- 第四节 从金龙村到“玫瑰小镇” / 154
- 参考文献 / 164

第八章 寻求文化认同的社区发展 / 165

- 第一节 基于文化保护的移民安置 / 166
- 第二节 移民安置的政策建议与行动框架 / 170
- 参考文献 / 175

附录 世界银行业务手册 / 177

- 附录一 业务政策·非自愿移民 / 178
- 附录二 业务政策·非自愿移民安置文件 / 187
- 附录三 世界银行程序·非自愿移民 / 194

后记 / 199

第一章

将知识转变为行动的文化追求

第一节 文化与移民安置中的文化保护

一、何为“文化”?

由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诸多差异,我们有必要对“文化”概念的演变历史做语源学意义上的分析。英文中的“文化”源于古拉丁词“colere”,意思是“居住、培植”,后从“colere”派生出“cultura”,意思是“耕种土地”。文艺复兴以后,“cultura”开始出现与人的心智发展有关的解释。在西方思想中,“文化”概念演化的一个最重要阶段是在18世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在其著作中在“文化”一词的词尾加复数,“文化”作为一个名词被理解为某一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总和。^[1]这个界定被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为“从人种学的广阔角度来理解……文化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那些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观、法制观念、习俗等”^[2]。

此后,“文化”概念不断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拉克洪通过对有关英语文献的分析,发现文化的定义居然有160多种之多。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即“文化由明确或含蓄的行为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其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思想,特别是其中所依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下一步行为的制约条件”^[3]。“文化”概念在19世纪末作为人类学的中心概念被提出后,对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格尔兹曾就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贡献做出如此的评价:(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思想的地平线喷薄而出,帮助解决了诸多的,甚至是所有的根本性问题。每个人都把它当成打开新的实证科学的钥匙,以建立一套崭新的分析方法的中心概念。于是,思想家们在各种学术环境中,基于不同的目的,运用抽象或衍生的方式发展它的内涵。^[4]

比较而言,这种蕴含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思想中的出现是西方概念中国化